

贵州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音文略表）

责任编辑 孟筑敏
技术设计 成戈
封面设计 黄小祥
孙晓云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22开本 7.625印张 149千字

1980年12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6,001—8,000

书号11115·22 定价 0.73 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邓恩铭同志年表	章 刚(1)
王若飞同志年表	赵西林(21)
周逸群同志革命的一生	唐承德(32)
贵州地下党早期领导人林青烈士	董有刚(69)
肖次瞻烈士生平	于建章(83)
顾希均烈士诗文选	于同智编(99)
我怎样投送《新华日报》	郎德服(108)
回忆筑光音乐研究会	谢凡生(124)
“沙驼”剧社始末	周德全(137)
黔东纵队边胞支队活动始末	田家乐(152)
忆龙腾霄同志和盘县游击队	李鸣武(170)
记大定(大方)羊场坝特别支部	王玉升(189)
打破敌人封锁 开展革命宣传	蔡之诚(204)
解放前夕贵阳电厂的护厂斗争	奚长年(209)
席大明参加贵州抗日救国军和夏曦同志牺牲的经过	
	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221)
我所知道的席大明	周稚九(225)
卢森先生遇害记	覃华儒(229)

补遗·订正

- 《遵义革命活动回忆》一文补遗 杨天源(239)
《红二方面军长征在贵州》一文订正 董有刚、于建章(240)
封一 黔灵泛舟(国画) 蒋梦谷
封二 陈毅同志诗(书法) 冯济泉
封三 红梅(国画) 肖之亮
封四 惠书 《人民日报》编辑部
Q81 土改简 会宁县史志办
Q82 金秋 陈家井村“十七”
Q83 采茶 余长河村支委办
Q84 采桑 固阳县史志办
Q85 养羊王 喀拉峻乡财政所(代大) 宋大平
Q86 新生系 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人史研究会
Q87 手风琴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文广局
Q88 会议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文广局
Q89 会议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文广局
Q90 大哥圆 陈大富苗族联营公司
Q91 雷锋草 陈善忠洪流沟
Q92 雷锋草 陈善忠洪流沟
Q93 雷锋草 陈善忠洪流沟

邓恩铭同志年表

章 刚



邓恩铭同志

邓恩铭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九大”讲话中回顾“一大”情景时，曾追念为革命牺牲了的“一大”代表邓恩铭同志，对全党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贵州省

革命委员会决定将邓恩铭同志在荔波城关的故居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介绍邓恩铭同志的革命活动，我们整理了这份年表，不当之处，望批评指正。

1900年旧历冬月十五日，邓恩铭（又名邓恩明）同志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城关的一个水族劳动人民家庭。父亲迁

居荔波城关之前，原住水浦。水浦在荔波东北四十里，是水族聚居地区，从榕江到荔波的大路就经过那里。那时，恩铭同志一家（祖父、祖母、父、母及四叔）生活，除靠两亩左右的自业地外，还租种了五亩田土。每年将收获的粮食拿一半交租后，所余下的很难糊口，因此不得不附带做点小生意，卖素饭、豆腐以贴补家用。

1905年，因人口增加，父亲邓福臣（又名国忠）迁居到荔波城内北街（今向阳路25号）以行医兼营草药为生，母亲黄氏则帮人做鞋子、推豆腐等。恩铭同志从小便帮助母亲从事劳动。

1906年至1910年，开始念私塾。恩铭同志自幼好学深思，成绩优异，性格活泼开朗，为人豪爽，善于团结学友，并酷爱诗词歌谣。

1911年，恩铭同志在荔波桂花书院小学读书，学校分高初两级，七年毕业。使用的是共和国教科书，上面注明培养学生的目的是：“注意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启发国民之爱国心，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等等，恩铭同志也从这时起开始接受反封建的民主思想教育。

1916年，恩铭同志除在校读书外，有时也随行医卖药的父亲走乡串寨，亲身体验到各族人民所过的悲惨生活，他曾编唱了这样一首歌谣：

种田之人吃不饱，
纺纱之人穿不好，

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从1915年起，荔波和全国一样，掀起了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复辟帝制、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的运动。恩铭同志和同学们一起，每逢赶场便拿着三角旗到街头巷尾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袁世凯想当儿皇帝的无耻行径，还积极参加了抵制日货的活动。

1917年8月，恩铭同志高小快毕业时，便随婶母去山东，投奔作了县官的二叔。他决心去闯出一条人生的道路，临行时慨然挥笔写道：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业不成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间到处是青山。

送别的同学问他何时归来，他以诗作答：

南雁北飞，去不思归，

志在苍生，不顾安危。

生不足惜，死不足悲，

头颅热血，不朽永垂。

经过一个多月的周折，恩铭同志抵山东济南，随即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

当时山东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也是日本帝国主义虎视鲸吞的目标。内忧外患使恩铭同志思虑国家的兴亡和人

民的命运。他为了将来能救国救民，在一中时，奋发读书，热心社会活动，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兼出版部部长，主编一中校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青年》、《新生活》等进步刊物在学生中广泛流传。李大钊同志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派吴慧铭（一说陈为仁）到济南传播马列主义，对恩铭同志影响很大，他毅然摒弃了“读书救国”的思想。这一年，他和有共同理想的山东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同志认识并结为亲密的战友。11月21日，他们两人发起并联络省立一中、省立一师、育英中学、工业专科学校、商业专科学校的部分学生，组织了“励新学会”，出版《励新》半月刊，恩铭同志是这个学会的负责人之一。

1920年初，恩铭同志在《励新》半月刊发表题为《济南女校的概况》的文章，主张女性解放，摆脱旧礼教、旧教育对妇女的束缚。

同年8月，恩铭同志代表学校出版部到天津南开大学参观。

10月，恩铭同志在一中校报《灾民号》专刊上发表《灾民的我见》一文，指出：“世界上的人，无论哪一种哪一族，彼此都是一样的人，富贵贫贱等等也没有不一样的，按社会学说起来，人人都是有衣穿、有饭吃才对，为什么大大的不然，富的富得不得了，穷的穷得不得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社会上一般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只知道役使一般苦同胞，为他们作奴隶牛马，还要横征暴敛，无所不

用其极！”他号召要“揭露豺狼似的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否则没有苦人过的日子！”

这一年，“励新学会”发生分化，右翼投入国民党。邓恩铭、王尽美、鲁伯峻等同志联系左翼激进分子，于9月间在济南教育会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址在济南城内贡院墙报街，今山东省人委院内）这是公开的学术团体，平时阅读马列著作，每逢星期六进行讨论。不久研究会又分化，其中部分人走上官僚政客的道路。邓恩铭、王尽美、鲁伯峻同志及两三位女同志组成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一年底，又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基础上成立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邓恩铭和王尽美同志是五人核心领导成员。

1921年3月，作为公开学术团体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被反动警察厅勒令解散，共产主义小组开始秘密活动。

7月，邓恩铭和王尽美同志代表山东共产主义小组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邓恩铭二十一岁，是十三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同时又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他和大多数代表一起批判了各种左的、右的错误观点，坚持了正确的建党路线。

“一大”结束后，邓恩铭同志回到济南，成立了中共山东支部。邓恩铭同志是支部的负责人之一，领导济南、青岛及淄川、博山、张店矿区等地的工人运动。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以王尽美、瞿

瞿秋白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参加。邓恩铭同志为代表团成员。代表团取道满州里、西伯利亚前往莫斯科。

这次会议是在列宁同志领导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国、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蒙古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约二百名，会议的目的是为了组织远东各国革命力量，向侵略远东的帝国主义国家显示力量和进行斗争，列宁同志还亲切地会见了大会代表。

在苏联期间，恩铭同志亲眼看到苏联各族人民团结在列宁周围，建设世界上第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动人情景，他还和苏联人民一起参加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一切使他激动得流出了热泪，更坚定了他对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心。

1922年夏，代表团从苏联回国，7月到达上海。此时，正值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王尽美、瞿秋白同志以代表身份参加大会，传达了列宁对中国革命所作的指示，在此基础上，“二大”制订了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邓恩铭回到山东后，在济南脱产作党的负责工作。这时，他到被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的，当时山东最大的淄博张矿区，对工人的劳动情况和生活状况进行调查。他在工人当中住下来，作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号召工人组织工会。在他的领导下，组织了“淄博矿业工会”，接着又建立了洪山矿区党支部，这是淄博矿区的第一个支部。矿区的工人运动很快发展起来。

1922年至1923年间，邓恩铭同志以淄川王宪章开设的照像馆为联络点，发展了赵豫章等小学教员入党，开展党的活动。

1923年1月，在中国人民的压力下，日本归还了胶济铁路和青岛市。党派邓恩铭和延波真同志去青岛。他们通过在青岛的一个统战关系鲁佛民（当时系国民党员），以教书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邓恩铭同志在东镇小学，延波真同志在西镇小学。他们深入到进步青年和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列主义，同时进行建党、建团工作。先后发展了电话局的赵鲁玉、胶济铁路四方机厂的傅书堂、丁子明等同志入党；发展了王翔午、丁祝华、孙秀峰（后叛变）等人入团。这些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也吸收入了党。邓恩铭还以丁祝华同志所在的学校——中国青年会小学（现湖南路五十一号）为通讯处，在这里收取党的刊物《向导》周报和《新青年》杂志等，并由丁祝华等同志推销这些刊物。《向导》和《新青年》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扩大了党的影响，传播了马列主义。不久，中共青岛市支部成立，邓恩铭任支部书记；组织、宣传工作，分别由王翔午、延波真两同志担任。

年底，党在胶济铁路四方机厂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共有十二名团员。

1924年初，中共青岛支部更名为中共青岛市委，邓恩铭同志任市委书记。他这时的公开职业是《胶澳日报》副刊编辑。恩铭同志积极开展党的工作，通过当地的教职员联合会，联络了小学教员，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同时在胶济铁路

四方机厂成立文化补习学校，给工人上文化课，借此宣传革命道理。在此期间，蔡和森同志到青岛，会见了恩铭同志。蔡和森同志向青岛部分党员讲解了社会发展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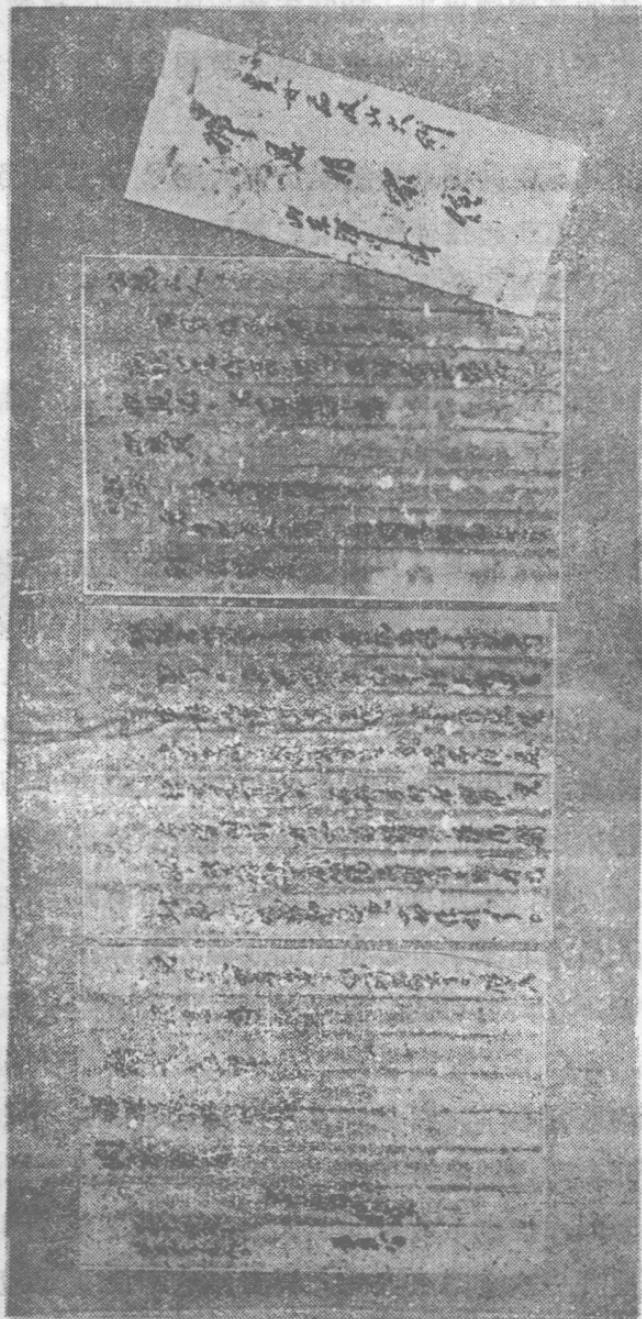
1924年“二七”大罢工周年纪念日，中共青岛市委在四方机厂及铁路各段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号召工人成立工会。

3、4月间发展了一批铁路工人积极分子入党。邓恩铭同志亲自介绍工人郭恒祥同志入党。这时入党的还有李俊泽、纪子瑞、王廷兰、尹振邦、马相阶、于维功等同志，并成立了党支部，傅书堂同志任支部书记。是年冬，青岛、高密、坊子、张店、济南等几个机务段都有了党的支部，其他各段也发展了一些党员。

5月8日，邓恩铭同志写信回家，回答父母多次去信要他不要干共产党，埋头读书，成就功名的劝告。恩铭同志写道：“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图一）

10月，邓恩铭同志到四方机厂的三义学校，以新闻记者的名义，召集了三十多个工人积极分子开会。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大意是：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全国民主空气抬头，军阀一定要失败。并着重指出，商人有商会，学生有学生会，工人应该组织工会，如果不组织起来，是一盘散沙，任人欺侮；组织起来就有力量，就可以提出我们的要求，可以改善生活待遇。组织工会必须严密，入会手续要慎重，参加工会的人要签名盖章，还要有两个人介绍，绝不能让工贼参加。这样内部才能更加团结，更有战斗力。

图一 一九二四年五月八日邓恩铭同志写给家里的信



在邓恩铭同志的具体领导下，1925年初，四方机厂秘密加入工会的工人就有八百多人，占全厂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1925年2月，中共山东党组织负责人王尽美同志到青岛，与邓恩铭同志一起在福禄寿电影院召开了青岛各界代表会，有三百余人参加。会上，王尽美同志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全国各地民主空气抬头，我们应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推选出代表，准备到北京参加国民会议。当天上午即成立了“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并推选鲁佛民、赵自声、二人为代表。

这时，胶济铁路管理局当权者发生了南北两派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为争夺局长一职。北派以赵德三为首，代表山东地方势力；南派以阚烽、朱延琪为首，其后台是交通部。春节期间，因为旅客多，铁路局为了多赚钱，加开了一列客车，并用双挂机车牵引。列车行至潍河桥时，由于牵引过重，压断了桥梁，造成旅客伤亡事故。交通部借机将局长赵德三撤职，派阚烽、朱延琪取代为正副局长。南派上台后立即撤换北派人员，北派不甘心他们的败势，打算组织工人罢工来打击南派，壮大自己的力量。此时，党员王翔午同志得知这个消息，即向邓恩铭同志汇报。一天夜里，邓恩铭同志来到四方私立培育小学，召集四方机厂党支部和工人积极分子二十余人开会，详细分析了南北两派之间的斗争，认为他们的内讧正激烈，谁也不敢得罪工人，敌人的裂痕可以利用。遂决定展开一次全路工人的大罢工。这不仅可以反对

阙、朱当权派，还可以在经济上提出提高工人工资的要求，在政治上使工人受到一次阶级斗争的锻炼，把青岛的工人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会后，党支部和工人积极分子开始了罢工的准备工作，他们一面发动组织铁路工人，一面派傅书堂等八个代表和北派赵德三等人谈判工人参加罢工问题，代表们按照邓恩铭同志的指示，提出工人可以参加罢工，但工人不能毫无所得，要求必须答应五个条件：（1）允许被开除的郭恒祥等四个工人立即复工；（2）承认工人有自己的工会；（3）不分壮工、徒工每人每月增加工资六元；（4）补发年终奖金；（5）给工人盖宿舍，准允工人买大块煤，工人买煤不需运费。赵德三等人不肯接受工人的这些条件，于是谈判破裂。

谈判破裂后，代表们立即向邓恩铭同志作了汇报。此时王尽美同志刚主持完“青岛国民促成会”回来，听到这个情况，就对代表们说：“我们和他们合作本是一种手段，谈判破裂很好，正表示我们工人有充分的力量。”他的话，给了代表们很大的启发和鼓舞。经过认真的讨论，青岛党组织决定，胶济铁路于二月八日单独举行全线大罢工。

1925年2月7日晚，经过周密准备后，邓恩铭同志在四方机厂召开了工会会议，宣布：“我们行动的时机已经到了，胶济铁路全线明天就举行罢工，我们厂明天也同时罢工。我们工会的人数已超过全厂工人半数以上，这是实现罢工的有利条件。这次罢工斗争，表面看来我们和路上北方派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各干各的。”接着他又作了具体布置，亲自制

定了复工条件。按照邓恩铭的布置，四方机厂党支部和工会组织了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和宣传队。

2月8日，胶济铁路工人举行全线大罢工。当天上午九时，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胶济铁路车务处长大村卓一率领一部分日本人，由日本司机开出一列火车，准备每到一站就留下几个日本人办理车站业务，妄图破坏工人罢工。列车行抵大港车站时，在工人们一片喊打声中，这伙外强中干的帝国主义分子狼狈逃掉了，他们妄图破坏罢工的阴谋被粉碎。据当时《申报》记载：“罢工场面非常壮观，全路大罢工在二月八日晚十二时开始，铁路工人个个斗志昂扬，用枕木钢轨封锁了铁路线，司机熄灭了机车内的炉火……各段各站的工人一律停止了工作……胶济铁路全部瘫痪了。”

这时，四方机厂罢工委员会按照事先和邓恩铭同志商定的复工条件，向厂方提出下列五条：

- 一、恢复被开除的四个工人的工作；
- 二、承认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
- 三、不论徒工、壮工，每人每天增加工资七分；
- 四、补发年终奖金；
- 五、工人和员司在福利方面同等待遇，分给宿舍，卖给块煤。

大罢工的第二天晚上，恩铭同志在四方三义小学召开了工人大会，恩铭同志在会上要求在罢工期间公开成立工会，把工人全部发展为会员，划分工会小组，选举工会小组长，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他还指出，大罢工一定会胜利。从而